

我这三十年

沈醉

沈美娟整理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 我这三十年

沈 醉

沈美娟整理

责任编辑·肖屏东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16,000 印张：11 印数：1—200,900

统一书号：1110·213 定价：(平装) 0.90元 (简装精装) 1.10元

# 目 录

前 言	.....	( 1 )
第 一 章	天亮以前	.....( 1 )
第 二 章	昆明监狱	.....( 11 )
第 三 章	重庆波折	.....( 25 )
第 四 章	春风化雨	.....( 38 )
第 五 章	真诚相待	.....( 49 )
第 六 章	铁窗趣事	.....( 58 )
第 七 章	劳动陶冶	.....( 74 )
第 八 章	喜悲交融	.....( 88 )
第 九 章	获得新生	.....(102)
第 十 章	新的生活	.....(113)
第 十 一 章	思家心切	.....(125)
第 十 二 章	温暖如春	.....(137)
第 十 三 章	冤家路宽	.....(151)
第 十 四 章	握手言欢	.....(166)
第 十 五 章	感愧万千	.....(181)
第 十 六 章	心悦诚服	.....(196)
第 十 七 章	不祥之兆	.....(207)

第十八章	株连妻儿	(216)
第十九章	证明材料	(223)
第二十章	二进深官	(233)
第二十一章	无中生有	(248)
第二十二章	难友情深	(259)
第二十三章	度日如年	(271)
第二十四章	重见天日	(278)
第二十五章	中国得救	(290)
第二十六章	香港探亲	(302)
第二十七章	岸在北京	(313)
尾 声		(329)
附 录	唐山之行	(339)

## 第一章 天亮以前

说来话长，事情还得从一九四九年说起。

当时，我任国民党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兼军统局云南省站站长。这年夏秋之间，云南人民发起了驱赶国民党中央驻云南的所有军政机关时，蒋介石和军统头子毛人凤不得不同意将云南站和交警部队撤出云南，去四川听候安置。但命令我仍以国民党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的名义，与云南省主席卢汉保持联系，与驻云南的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加强合作，企图控制云南。

我除了将云南站已经暴露身份的特务由副站长皮绍晋率领去重庆外，凡未暴露身份的均予留下。云南支台亦随同撤走，只在我家楼下设一小型电台，与台湾、重庆保持通讯联络。当时，我家妻儿老小都已离开昆明，先到重庆去住了。我的家就成了军统局云南站的指挥所。

“九九事件”\*后，毛人凤赶来昆明，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整日和我策划如何控制云南的阴谋。他决定重新恢复云南站的组织，并替我向卢汉要了一个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的名义作掩护，以便更好地配合云南站搞特务活动。

不久，蒋经国、蒋介石都先后来到昆明，命令我在云南站住脚跟，一定要竭尽全力保住云南这个唯一可以直接与国外联系争取援助的反攻战略要地。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人民解放军以势如破竹之势直指西南，眼看成都已是旦夕不保，云、贵等省都要解放了。我根据情报早已了解到卢汉在暗中作了投靠人民的种种准备。因没有得到毛人凤要我立即杀害卢汉的命令，所以，只把情况电告毛人凤，请求指示。可能是由于时局紧张，怕杀了卢汉会导致云南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毛人凤迟迟没有下达命令，只让我严密地监视卢汉。

十二月六日，我亲自去见卢汉，对他进行试探。我提出要在昆明进行一次大搜捕，并对发电厂、兵工厂等大型厂矿作好了爆破的准备工作，打算在解放军进攻昆明前进行破坏。卢汉听了我的话，摇了摇头说：“目前时局紧张，不能这样做，免得人心混乱。”由此我更感到情况不妙，心里非常着急。

九日下午，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军统总务处处长成希超、经理处处长郭旭三人由成都同机飞到了昆明。由于当时成都的局势更加紧张，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成都的

---

\* 九九事件：指一九四九年九月九日，军统在昆明发动的一次大逮捕，被捕的革命人士和爱国青年近五百人之多。

飞机不直接飞台湾。要去台湾，得先到昆明，转乘飞机。徐远举、成希超是在重庆执行了大屠杀、大破坏任务之后，急于想飞去台湾的。郭旭带着一手提箱金条，这是保密局的经费，他也是要赶去台湾的。他们一到昆明，就要我立刻安排去台湾的飞机。他们到后不久，乘另一架飞机到昆明，重庆卫戍总部保防处长周养浩，也从机场打电话给我，要我安排去台湾的飞机。他比徐远举等更加紧张，连我家都来，怕昆明的时局发生变化。当时，我得到情报：卢汉令禁止昆明的飞机飞出，但可以让外来的飞机降落。我怕引起徐远举等人的惊慌，答应第二天早上一定给他们准备飞机去台。

接着，我就安排徐远举等人吃晚饭，并陪他们去洗澡。这时，我的心情是十分紧张的，因为我知道卢汉随时都可能起义。徐远举看出了我的不安，我只好把情况告诉了他。他安慰我说：“西南长官公署长官张群已经到了昆明，看来卢汉暂时是不会有什麼行动的。”我想，这倒有可能。因为张群不是卢汉的上司，而且曾经在蒋介石面前担保过卢汉。他们私交也很好。张群这个被称为“智多星”的国民党元老，是有办法说服卢汉的。

正当我安排郭旭、成希超去“皇后饭店”住宿，送徐远举去卢汉的副官处长朱家材家的时候，传令兵送来了张群要我晚上十点去卢汉家中开会的通知。我接到通知后，是去还是不去，心里犹豫不定。按军统局的系统，我不属他管，可以不去；但按保防处的系统，我就不能不去。我很不放心地

问徐远举：“你看这通知上是不是张群常用的图章？”他仔细地看了看，肯定地说：“没错，是张群的。”但我还是不想去，徐远举劝我还是去的好。他说：“张群来了，一定会有具体布置，你还是去听听张群的意见。”我想了想，觉得也对，表示同意去，但心里总是嘀嘀咕咕的。

为了慎重起见，我接连分别给绥靖公署的其他几个处长打了电话，问他们是否接到了开会的通知，他们都说没有。我又打电话到卢汉家找张群，想把情况问清楚，得到的回答是：“张长官很忙，你准时来开会，有事当面向他说。”这时，我意识到情况不好，可能有去无回。但事已至此，不去也不行。

为了以防万一，我向台湾发出了最后一个电报，向毛人凤表示：“时局已发展到无法挽回之势，我当尽力而为之，如不成功，只有来生再见。”同时，我又与两路警务处长苏子鹤及副站长胥光辅商定：如果我晚上十一点钟没有电话回来，他们便把档案、名册烧毁，立即将交警部队、刑警大队等城内所有人员，以及电台、文件等迁到二十六军军部，并将国防部新近委任我的“国防部云南游击总司令”名义公开出来，所有一切力量均编入游击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临去之前，我还把自己乘用的一辆轿车交给了胥光辅，万一有情况，我这辆新车跑得快，便于他们行动。我又把随身带的手枪、笔记本等物留下，因为我估计若出了事，光凭我的两支手枪是解不了围的，还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我开着胥光辅的一辆吉普车前去开会，一路上，心里老

是在想：不去开会吧？怕真的是张群有新的具体布置，自己不了解情况，就无法完成蒋介石、毛人凤交给自己的任务，即使自己将来能逃到台湾，也定会受到军法惩处：去开会吧？根据卢汉的情况，可谓是凶多吉少。离卢汉的公馆越近，我的心情就越紧张。我一边开车，一边拼命地抽着烟。

为了摸清情况，我故意不走卢汉的旧公馆正门进去，而绕道翠湖东路，驶向卢汉的新公馆。我把车开进公馆大门，下车后刚走上台阶，正好看到张群一个人懊丧地坐在大客厅里，门外站着几个人。张群看到我时，一句话没说，只无可奈何地把两隻手一摊，肩一耸，并吐了吐舌头，表示一切都完了。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心不由得往下一沉，连忙抓起走廊上的一架电话机想打电话。卢汉的几个副官立即围了过来，对我说：“电话不通了。”并引领我往青云街老宅的会客室走去。这时我已知道，自己被软禁了。

当我故作镇静地走进会客室时，一抬头就看到了第八军军长兼第六编练司令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师长石补天等亦先后到达这里。大家都面面相觑，无话可说，知道自己已成瓮中之鳖，无计可施，只好听天由命。这时的客厅里，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我们七个军服整齐、胸佩勋标的人，各自坐在一个沙发上，皱着眉头，狂抽香烟。

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卢汉的警卫营龙营长带着十四个持手枪的士兵进入会客室，毫不客气地说了声“奉命检查”，便每两个士兵看住一个，龙营长亲自搜查。可能他认为我最年轻，最难对付，所以第一个就是搜查我。他在我身上搜查

了一遍，除了十两黄金之外，竟一无所获。龙营长急躁地问我：“你天天挂在身上的手枪在哪里？”我笑着说：“早放在家中，才来开这个‘会’的。”我心里明白，当时只要一反抗，他们就会立即开枪，先打死我。“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索性双手高举，任他们全身搜遍。

突然，“啪”的一声枪响，我不由得一惊，心想：卢汉要在这间豪华的客厅解决我们了。我知道反抗已无济于事，就把眼睛一闭。随后，听到龙营长训斥士兵的声音，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士兵不小心，枪走了火。我睁眼一看，地板被打了一个窟窿。

搜查完毕，龙营长带着士兵走了。我们七个人都气愤地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有的紧握着拳头，恨得咬牙切齿；有的用拳头捶打着沙发扶手，发泄心中的恼怒。我咬着牙紧紧地抓着沙发扶手，恨不得一下把它捏成粉末。尽管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事到临头，仍然觉得受了很大的侮辱似的，后悔自己对情况估计不足。

当晚两点半左右，卢汉的副官把李弥、余程万叫了出去，坐上汽车走了。我以为是分别拉出去解决掉，心想自己才三十六岁，就这样轻易地死了，实在有点不甘心。可是，不甘心又有什么办法呢？死就死吧，这样倒也能落个“忠君报国”的“美名”。一刻，卢汉的副官又把我和宪兵司令部代司令李楚藩带上了汽车。看到汽车一直往五华山省政府办公大楼驶去，我这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下车后，我们被带到四楼卢汉的办公室。进去一看，李

弥正在和张群的秘书处长周君亮谈话。周君亮告诉我们说，张群到昆明后，卢汉根本没与他见面，就把他软禁在自己家中，张群的随员都被扣留在五华山卢汉的办公室。卢汉派人把张群的图章抄走后，便给我们发了开会通知。大家这才明白，自己上了卢汉的当，都愤愤地骂了起来。这时，几个看守走了进来，请我们休息。我一看，办公室里摆了几张行军床，床上放着干净的新被褥，便脱去上衣往床上一躺。李弥见了，走过来不由分说地踢了我一脚。我假装不解地问：“你干什么？”他气愤地说：“这么严重的情况，不好好商量，你还睡觉？”我笑着说：“要杀头也是明天的事，让睡就睡。”因为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是商量不出什么结果来的。同时，我用手指了指窗外，示意有人在监视我们。李弥这才没有再作声，恨恨地坐在沙发上生闷气。

我躺在床上，佯装睡觉。其实，哪里睡得着呢？局势已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自己还这么年轻，上有老母，下有妻儿，难道和蒋家王朝一同覆灭了不成？想起戴笠死后，毛人凤等人排挤我的事情，想起大难当头，毛人凤等人又把我推到第一线，自己则逃之夭夭的情景，心里不免有些恨。我想，若戴笠活着，他决不会把我丢下来收拾这个烂摊子。现在名义上是委我重任，实际上是把钉死在这里。若能守住云南，他们坐享其成，若守不住云南，我就是个“替罪羊”。想来想去，我觉得若有路可走，决不放过机会。可是，公开参加起义，又觉得对不起戴笠多年的栽培，又怕自己的妻儿老母受到特务的迫害。这一夜，我就这样翻来覆去地胡思乱想，不知如何是好。

第二天早上，刚吃过一顿丰盛的早餐，卢汉的民政厅长杨文清便把我们一个个地请了出去。到了三楼会议室，在便衣警卫团团围住之下，杨文清拿出了一份事先拟好的起义通电，要我们签名。他们还特意代我拟好了一个要我的部下听从卢汉指挥、不准抵抗的手令，叫我签字。我拿起他们代拟的那张手令一看，便发现上面写的，并不符合军统的行文语气，特务们一看便会知道这不是我写的东西。这时我想，事已至此，不签名也不行，既然要签名起义，就不如干得彻底点，免得自己摆下的烂摊子无法收回，脱不了责任。我于是对他们说明，这个手令不会起作用，反而会出毛病，应当由我按军统习惯的行文法，亲笔另写一张手令，才能生效。他们当然同意我的意见，但又怕我太紧张写不成。我却满不在乎，拿起毛笔写了一份手令，字体和平日完全一样。手令的大意是：所有在云南的公、秘单位的人员，都要服从卢汉的命令，立即停止一切活动，并交出武器、电台等，自动出面，到指定地点办理登记手续，听候另派工作。……

他们看到我亲笔写的手令后，非常高兴。还把手令制成锌版，大量印发，到处张贴。这个手令在十二月十一日的《云南日报》第一版上刊登出来之后，广播电台又连续广播了三天，好让分散在各处的特务都能看到、听到。

当我如释重负似地从三楼回到四楼时，看到李弥伏在窗口。他一见我便热泪横流地说：“你看，闹成这个样子，我们怎么对得起人？不如死了算了。”说完就准备从四楼窗口跳下去。我忙走过去，一把抱住了他。经过再三劝慰，他才慢慢

平静下来，气愤地说：“他妈的，要起义，老子自己不会起？要等别人牵着鼻子干？”这时，我也只好摇头叹气，无口以对。

事情并不象卢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起义通电发出的第三天，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不但没有按起义通电的要求服从卢汉指挥，反而开始了对卢汉的进攻。二十六军从东南角开始向昆明进攻；第八军驻在大板桥的一个补充团，也与卢汉的保安团打了起来，形势越来越紧张。这时，卢汉发给了李弥和余程万为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的委员，但是局势并没由此缓和下来。

一天上午，云南保安旅旅长龙泽汇陪李弥的妻子来见李弥，并传达了卢汉希望李弥通知部下不要攻打、听候改编的意见。李弥按卢汉的意见写了一封信，交给他的妻子，送到大板桥去。当天下午，李弥的妻子就回来了，并带来了一封复信，信中表示愿意接受李弥的命令，并提出让李弥本人早日返回部队的要求。李弥把信交给了杨文清，杨文清便拿走这封信送给卢汉去了。等杨文清他们一走，李弥的妻子见室内没有旁人，便把自己的旗袍掀起向着李弥。李弥伏身一看，原来在他妻子的旗袍里子上，用毛笔写了几行小字。这也是他部下给李弥的一封信，内容却与刚才那封完全相反，说全军的官兵表示：不但不准备停止进攻，而且要竭尽全力攻打昆明，救出李弥。

第二天，二十六军和第八军果然集结了所有的部队向昆明进行猛烈的袭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卢汉便将李弥和余

程万放了出来。二十六军还是不同意，一定要师长石补天返回部队，卢汉只好又把石补天也放了出去。他们出去之前都满口答应，归队后，一定制止部队攻打昆明。结果，李弥等人出去后，不但没有停止对昆明的进攻，反而打得更加激烈了。这两个军的装备和人数都远远超过卢汉的几个保安团，形势越来越紧迫，昆明眼看就要被攻下了。卢汉怕我们出去后会与李弥一起攻打昆明，就继续把我们软禁在五华山省政府办公大楼里。

十二月十九日上午，台湾派来的飞机开始轰炸五华山，卢汉已作好了随时突围的准备。因为怕昆明被攻破时，带着我们突围会增加麻烦，他便将我和李楚藩、沈延世（国民党空军五军区副司令）、童鹤莲（宪兵西南区司令部副司令兼参谋长）四人移送到了钱局街陆军模范监狱。由于飞机不断地轰炸五华山，我们也乐意离开那里，免遭不测。

尽管李弥等实力雄厚，但卢汉在云南人民的全力支持下，终于击溃了他们的进攻。加上人民解放军已经向云南挺进，李弥只好率部仓惶逃往滇缅边境，最后还在边境骚扰了多年。

一九五〇年三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后，实行了军管。卢汉在办理移交时，把我们在陆军监狱的人都当成要犯交给了昆明军管会。当时，我对这种情况一点也不知道，还满以为：我的绝大部分部下，已按我的手令，将电台、武器都交了出来，并没有参加李弥的反攻战斗。现在战局平定了，我的问题总该得到处理了吧。

## 第二章 昆明监狱

解放军接管陆军监狱之后，这里的情况完全变了。原有的看守和负责人都已大部撤换，制度比过去严格得多，我的行动受到了限制，关押的性质也变了，因此，思想越来越抵触。

在这之前，卢汉将我转移到陆军监狱关押时，我的思想还很乐观，认为自己在监狱不过是暂避一时而已，只要战事平定下来，无论谁胜谁负，我都是可以出去工作的。若中央军取胜，自然会救我出狱，官复原职；若卢汉的保安团取胜，同样会因参加起义之故而释放我。心想在这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时刻，自己能在这个“保险箱”里坐观龙虎斗，倒也是不幸中之万幸。

陆军监狱是我过去与之常打交道的地方，这里从上到下的工作人员几乎都认识我。我曾到此陪审过案件，典狱长和总务主任等人待我为上宾。此刻我被关到这里，看守们出

于职责而不敢放我出狱，但给予我最大限度的自由。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我还是过去那个可畏可敬的“云南区专员兼军统局云南省站站长”。《云南日报》上发表的起义通电和我的亲笔手令，他们都早已看到，也都认为我在此关押只是暂时的，将来出去以后，还会象过去那样威风的；在我关押之时，给我一些关照，日后若有求助于我的地方，我也自然会给予方便。所以，无论是监狱长官还是看守，替我办事都很殷勤，多方对我给予便利。

我在狱中，不仅可以四处走动，任意吩咐看守买东西，送信，打听情况，而且当我母亲和妻子生日时，我说一声“给我往香港发个电报”，总务科长就立即帮我发出去，我就在电报里向母亲、妻子祝寿，问候。生活无拘束，倒也蛮舒适。

还有是同狱的许多旧部下和国民党军政界的一些犯人，并不因为我被关押，而一反过去对我的态度。他们仍象以前一样尊敬我、体贴我。吃饭时，我常常在馒头里发现他们对我进行安慰、让我保重身体的纸条。我过去从来不打牌，更不会打牌，他们为了让我开心，每当白天没事干的时候，就来拉我去打牌，而且每次都让我赢。我常开玩笑地说：“这可真是在鸡脚杆上刮油啊！”

实际上，我当时并不缺钱花。昆明的几个大资本家，如西南银楼专作金银首饰生意的孙子顺等，因为解放前我帮过他们不少的忙，他们在我被关押时，常常给我送钱送物。有一次，监狱不让孙子顺送东西进来，他便与看守大吵大闹，拍着胸脯说：“沈醉是我的朋友，我就是给他送东西。”当时

的监狱旧人员多，只好让他送。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总是很感动。我想如今身陷囹圄，这些人还这样同情、支持我，心里感到非常欣慰。

当时，在监狱中我唯一的苦闷就是和徐远举、成希超、周养浩等人关在一起，他们老是骂我“卖友求荣”。特别是徐远举，向来脾气暴躁，一见到我便圆眼一瞪，连讽带刺地说：“你出卖了我们，怎么也关起来了？没给你一官半职当当？”我听了这些话，心里非常难过。其实，我何尝愿意“卖友求荣”呢？实在是因为他们都是重庆大屠杀、大破坏的直接参与者和主持者，我既参加了起义，再把他们放走，就不好交代。在说出他们几个人之前，我也是经过一番很痛苦的思想斗争的。我一方面考虑到自己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不交出他们，他们不免要遇到种种不测。因为当时卢汉已完全控制了机场，完全控制了整个昆明市区，他们坐飞机逃走是不可能了，若坐汽车逃跑，他们对昆明的地形又不熟悉。如果让当地群众或保安团抓住，徐远举的脾气又暴躁，可能当时就会遭到杀身之祸，不如我起义后，倒有可能将他们保住。当然，在我自己问题没解决之前，他们也只好在狱中委屈一下了。

据说，在我说出徐远举等人的住处后，卢汉派去的人便立即行动。当时，徐远举在朱家材家里，一直没见到朱家材的面，他已感到情况不妙，就开上朱家材挂有特别通行证的汽车往外跑，汽车开到胡同口，刚好卢汉派去的人赶到，将他截住逮捕了。周养浩在机场也觉察到情况不妙，连忙穿上便服，